

业内人士认为 互联网金融准入管理可采取注册制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赵静扬

多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近日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表示,互联网金融方兴未艾,而下一个战场就是移动互联网金融。对于互联网金融监管,专家建言要减少不当监管,激发金融机构活力。对此,监管层人士在表明“创新监管”态度的同时,也一再强调互联网金融将遵循“创新监管、适度监管、分类监管、协同监管”的监管原则,互联网金融公司也必须时刻将消费者权益放在核心位置。

不能低估互联网金融影响

互联网金融对于传统金融机构,甚至整个融资市场而言,带来冲击的同时,还有更多的机遇与合作。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副司长徐诺金表示,不能低估互联网金融的影响和冲击,一定要以开放的心态和紧迫的责任感来迎接这场战役。互联网金融可以将现在在传统金融覆盖不到的地方,通过移动金融的方式完成覆盖,把现在不敢放的贷款,通过数据分析放出去。

“互联网金融冲击的是传统金融的物理形态、经营管理方式等等,但是金融的本质没有变化,这就是要有信用,要有强大的风控能力,客户才会留得住。”徐诺金认为,互联网金融将冲击现有金融格局,甚至可能产生



本报记者 车亮 摄

互联网时代的金融“巨无霸”。另外,还将冲击分业经营格局和行业限制,使金融内部和金融与实体之间的融合更加密切。

蚂蚁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俞胜法认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是竞合的关系。互联网金融的优势是提供大众的、标准的和小额的金融服务,而传统金融则是提供个性化的、大额的金融服务,这可以形成互补。但是在成本、信息等方面,二者又是相互竞争的关系。尤其在大数据方面,互联网企业有非常明显的优势。互联网金融对传

统金融最明显的挑战是,互联网金融对消除金融压抑,或者推动金融自由化,做出了相当大的贡献。

俞胜法指出,互联网金融和传统金融最明显的区别在于理念和思考模式。传统金融以产品为中心,而互联网以客户的需求场景出发,用最合适的产品打造最适合客户的体验。

互联网金融要有准入管理

对于市场关注的监管问题,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吴晓灵认为,要改进金融立法修法的理念。未来立法要厘

清市场主体风险控制与市场外部性控制的边界,减少不当监管,激发金融机构活力。同时,立法要规范从针对机构的监管转向主要针对金融业务的监管,用业务牌照的方式确定监管主体,协调统一的监管标准。

徐诺金指出,互联网金融不能过度自信,要充分认识金融的本质,不要低估金融的复杂性和严肃性,要遵守金融的规则,坚守金融的底线。互联网金融一定要有准入管理,这个准入管理可以不是审批制,可以像改革上市公司制度一样采取注册制。同时,要侧重于互联

李伟:调动各方积极性 推动能源革命

□本报记者 任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伟27日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指出,要力争在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峰值,将2030年的能源消费量控制在60亿吨标煤以内。2030年到2050年这一阶段的重点任务是将可再生能源发展成为新增能源供应的主要来源,并大规模地替代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实现局地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排放持续下降,能源发展中的资源环境约束基本消除。

李伟表示,体制改革是能源生产革命、消费革命、技术革命推进和实现的根本保障。所谓体制改革,就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从计划和指令为主能源体制到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能源体制的重大转变。通过体制改革调动方方面面的积极性,推动能源革命的实现。

一是放宽市场准入,促进公平竞争。在油气领域,鼓励各类所有制企业进入非常规油气资源的勘探开发,放宽油气储运、加工、销售的市场准入,取消对原油、成品油、天然气进口的限制。在电力领域,推行大用户直购电和售电开放,在发电侧和售电侧形成多买方、多卖方的市

场竞争格局。当然,在放开准入限制的同时,还要加强产品和服务质量的监管,让竞争主体在同样的标准和水平上竞争。加快实现可竞争环节与自然垄断环节的分离,放开竞争性业务,加强对自然垄断环节的监管。深入研究油气管网的有效管理体制和运营模式,探索电网输配分开的必要性和运行机制。

二是改革能源价格形成机制。价格改革的核心是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而不仅仅是价格水平的调整。上网电价逐步由发电企业与大用户根据双边合同确定;输配电价实行政府管制,并建立能够反映电网企业真实成本的定价规则;居民和中小工商业用户要引入峰谷电价和实时电价。推进形成成品油市场决定配置的价格形成机制,最终实现政府有关部门不再直接规定成品油价格,改为在石油价格出现较大幅度波动时采取临时性干预措施。

他表示,当前重点推行基于市场定价的碳交易制度,在对实施效果进行评估的基础上,研究实行碳税的必要性和方式及征收范围。加快电力法和煤炭法的修订,制定石油天然气法,进一步研究推进能源立法。

李伟提出,近中期要实施能源总

量控制,推动能源消费革命。优化能源生产、转化和利用结构,推动能源生产革命。首先,大幅度优化能源供应结构。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确保实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15%的目标。2030年,非化石能源比重进一步提高到20%甚至更高的比例。加大非常规天然气勘探开发力度,提高天然气在能源生产和消费中的比重,2020年和2030年占能源消费的比重分别达到10%和15%。显著降低煤炭消费比例,2020年下降到60%左右,2030年进一步下降到50%以下。到2030年初步形成煤、油、气、核、可再生五足鼎立多元化的能源供应结构。

其次,优化能源使用结构。统筹考虑能源和化工两个领域,石油应主要用于生产交通燃料,煤炭优先用于发电,促进煤炭高效清洁利用;煤化工主要走多联产的技术路线,适度发展煤制油、煤制气等项目。

第三,优化能源转化结构。要明确“大电大网”与分布式电力系统并重的发展思路,形成安全可靠、经济高效、绿色智能的电力系统。实施“追赶”与“跨越”并重的能源技术战略,推动能源技术革命。制订符合中国国情和全球能源技术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技术路线图,加大对能源战略性前沿技

术和重大应用技术的研发支持力度。加大非常规油气勘探开发、煤气化整体联合循环等新一代火力发电、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生物质能源、第三代和第四代核能、电动汽车、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储能、氢能和碳捕获及封存等新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商业化应用。创新组织形式,建设公共研究开发平台,推进协同创新。

他表示,要加强能源国际合作,保

障能源供应安全。加快推进石油进口来源和通道的多元化,降低石油进口来源对中东和运输通道对马六甲海峡的依赖程度。鼓励产油国石油公司和跨国石油公司来华投资中下游业务,鼓励企业走出去投资上游业务及炼化等中游业务。提高储备和应急能力,健全国家、商业、社会多层次的石油储备体系,鼓励各类企业参与石油储备,加快石油期货交易中心建设。

专家称应防范地方债 引发系统性风险

□本报记者 陈莹莹 赵静扬

在金融创新步伐不断加快、融资手段多样化的大背景下,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引起专家和业内人士的关注。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尹中卿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表示,要防范地方债可能引发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区域性的财政风险和系统性的金融风险互为因果,又组织关联,循环影响,叠加蔓延。在地方债规模借新还旧、展期超过一定期限后,巨大的债务不仅使地方政府陷入财政危机当中,也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区域性的系统性风险。

针对地方债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尹中卿认为,我国地方债的三个特性注定了其有引发风险的可能,一是过度依赖融资平台;二是地方债的资金主要是来自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贷款;三是过度依赖土地收入。他指出,在经济下行过程中,一旦政府信用链条断裂,就有可能爆发区域性的地方债务风险。

尹中卿强调,当前需要引导地方债走上制度化、法制化的轨道。按照《预算法》规定,鼓励社会资本通过公司合作伙伴等方式参与基础设施的投资和运营。同时,保障和促进地方政府依法管债,将债务收支门类纳入全口径预算,包括负债率、债务率、偿债预定期率、借新还旧率,加强债务存量的监督和运行,保证债务偿还公开透明。

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认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关系处于失衡状态,在维持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格局大体不变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必须承担更多支出责任,以降低地方财政对中央财政的依赖度。

新修订后的《预算法》,允许地方政府适度举债。但多位与会专家指出,《预算法》修改仅仅是理顺中央和地方财税关系,疏解地方债风险的开始。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高培勇表示,《预算法》所规定的自发自还的发行体制改革,都只是解决当前现实问题的手段,并没有从体制、机制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阎庆民:五方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本报记者 陈莹莹

银监会副主席阎庆民27日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表示,要把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作为一项先导性、战略性、全局性的工作。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必须早谋划、早布局、早推进,使金融机构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阎庆民认为,随着金融改革加速深化发展,我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亟需加快提速。他提出,要从五个方面加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构建良好的金融法制体系,健全完善的法律法规体系。自1995年实施的《商业银行法》、《担保法》、《票据法》等金融法律法规已经历

了20多年,因此随着近几年金融改革、金融创新步伐的加快,需要加快修订相关法律法规。此外,需要健全法律机制的配套,如仲裁机制的完善等。

二是消除多余的市场壁垒。比如当前的登记托管、支付清算等领域都是碎片化运行,下一步需要整合相关金融领域,消除金融体系内多余的业务领域壁垒。

三是营造健康的社会信用环境。小微企业融资难在西方国家的解决方式是给小微企业主提供融资,因为西方社会每个人都有较为完善的个人信用信息。而我国因为没有完善的个人信用信息,银行判断风险难度大,小微企业融资的难度也因此提升。因此,完

善社会征信制度对于解决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至关重要。

四是搭建稳健的支付清算体系。互联网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得在原有支付清算基础上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远程支付等。因此,在原有支付清算基础上,结合当前移动互联网支付的特点,及时更新、稳定支付清算体系对于稳定金融体系运行同样重要。

五是保证安全的科技信息系统。一方面要提高核心技术的研发,我国金融机构核心的科技系统基本是引自国外,自主研发的系统较少,这对保护金融机构科技信息提出挑战。另一方面要提高客户信息的保密度,防止客户信息泄露等事件的发生。

周延礼:保险业将迎来前所未有政策红利

□本报记者 任晓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周延礼27日在“《财经》年会2015:预测与战略”上表示,保监会将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准入和退出机制,以提升保险资金的配置效率为重点,全面深化保险市场的改革。继续全面推进寿险产品的利率改革,把定价权还给保险公司和市场,让保险公司在公平统一的市场中更加灵活地开展运营。

周延礼强调,下一步要推进商业车险费率条款的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建立科学、合理符合中国国情的商

业保险费率管理制度。要进一步推进以监管现代化为着力点,全面深化保险监管的改革,以保护消费者的利益、防范市场风险、促进市场繁荣为监管目标,坚持维护公平和促进效率,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宏观监管与微观监管、原则监管和规则监管相统一,形成理念科学、目标明确、运行有效、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现代保险监管体系。

与此同时,保监会要积极鼓励投资方式创新,按照保险资金自身的规律,探索股权、债权结合的形式,对接实体经济的实体需求,积极推动保险资金运用组织机构的创新。

周延礼称,随着《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保险服务业的若干意见》各项政策的细化落实,我国保险业将迎来前所未有的制度红利和政策红利。《意见》明确提出保险业发展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坚持市场主导、政策引导。这意味着推动保险业发展的手段将更加丰富,机制更加灵活。比如对商业化业务,重点在于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减少行政干预;对具备社会公益性、涉及国计民生、服务经济提质增效的保险业务,需要加大政府引导和政策支持的力量,在一些难点和重点的保险领域尽快实现破题,加快发展步伐。

不仅沪港通
交通银行集团助您畅行资本市场

2014年11月17日,伴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香港交易所同时敲响的开市锣声,沪港通业务在两个交易所同时开启。这一历史性的事件,成为中国金融市场开放进程中一个新的里程碑,必将对人民币国际化、优化对外资产结构、满足居民对外投资需求产生积极的意义。作为中国主要金融服务供应商之一,交通银行集团集团旗下交行、交银国际控股等多家子公司力量,通过总分行联动和境内外联动,为广大客户提供“一站式”结算、投资、投行等跨境、跨市场金融服务。本期为您介绍“一站式”结算服务。

“一站式”结算服务

交行凭借在证券交易资金结算、跨境结算、离岸人民币市场等金融领域具备丰富的市场经验和独特优势,成为首批港股通跨境资金结算银行。港股通首批结算银行资格的获得与交行长期以来在资本市场服务方面的优异表现密切相关。

从境内证券资金结算来看,交行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以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等多个市场和主体签订了全面合作协议。1998年至今,交行已经连续16年保持证券资金结算业务的零差错。近年来,交行证券资金结算规模在20家结算银行中始终位居前列。境内投资者服务方面,交行与96家证券公司建立第三方存管业务合作,合作覆盖率达到97%。同时还与业务密切的证券公司开展7*24小时转账、周末签约、移动POS签约等合作,为证券投资者提供更广泛、更灵活的选择。证券资金结算创新方面,除了沪港通结算外,2014年交行成为首批系统成功对接新三板资金结算业务的结算银行。同时,面向即将推出的个股期权投资者,交行配套的银行转账系统也已通过全网仿真测试,准备就绪。

从香港证券资金结算来看,交行香港分行成立于1934年,是在香港持续经营时间最长的银行之一。交行香港分行是香港联交所旗下场外结算有限公司创始股东之一,一直为香港证券市场提供资金结算服务。同时,交行香港分行与123家当地证券公司开展IPO新股认购融资合作。2013年融出的新股认购资金为1166亿港元,在业内名列前茅。

从离岸人民币业务和其他境外市场来看,2014年7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的见证下,两国央行等相关部门签署并指定交行作为首尔人民币业务清算行。2014年10月,交行与韩国证券登记结算院签署全面合作协议,双方将在离岸人民币支付结算、离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新产品研发等领域开展全面合作。

近年,交行积极推行“两化一行”战略(“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不仅境内证券市场交易结算■处,行业领先水平,跨境结算、离岸市场和国际托管业务也拥有多个行业第一。其中,交行国际托管业务目前服务网络已实现北美、欧洲及亚太等全球主要证券市场的全覆盖,并在香港建有“交银资产托管中心(香港)”,该中心是中资银行首家在境外开设的集产品研发、营销、运营于一体的全牌照专业托管平台,开创了中资托管银行迈向国际托管市场的先河。截至2014年10月末,交通银行国际托管规模超过1100亿美元,托管产品包括RQFII、QFII、QDII,三类机构、股权激励计划、ESCROW SERVICE、境外货币基金和私募基金、债券托管等类型,托管客户涵盖香港、伦敦、台湾、日本、韩国、瑞士等国家和地区的资产管理公司、商业银行、保险公司、期货公司、慈善基金会等,托管资产涉及股票、基金、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期权期货、金融衍生品等各类投资工具。基于健全的境外托管服务平台和强大的全球结算网络,交通银行可向海内外客户全球资产配置提供包括资产保管、交易清算、核算估值、投资监督等全流程托管服务以及结算代理、评估咨询、投资顾问等服务在内的■揽子金融服务方案,满足客户跨境投资的托管服务和相关金融服务需求。

交通银行集团,不仅沪港通,全方位助您畅行资本市场。

交通銀行
BANK OF COMMUNICATIONS

交银通业
INSTITUTIONAL FINANCIAL

您的财富管理银行